

云清：协助丈夫组建内蒙古骑兵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⑧

云清，女，蒙古族，1921年12月25日出生，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人。云清是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乌兰夫的胞妹，是开国将军、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主席孔飞的妻子。

1925年，云清的大哥乌兰夫去苏联学习时，她只有4岁。1929年，乌兰夫从苏联回到家乡开辟革命工作，打破女孩子不读书的旧习俗，专门在家里为小妹云清和女儿云曙碧办起了学堂。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奎璧、朱实夫、赵诚、吉合、高凤英等人经常来到家里秘密开会，八岁的云清带着云曙碧负责在外面放哨。紧张神秘的环境给幼小的云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4年初，乌兰夫来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土默特学校，以教员的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2岁的云清跟着大哥一家人也来到城里读书，当时经常有

反对日本人的活动，土默特学校组织学生们上街游行，云清和同学们也举着小旗子高呼抗日口号，高唱爱国歌曲。她在大哥的言传身教下，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战开始后，乌兰夫安排家人回到塔布子村，云清积极投入了抗日活动。

1939年，绥远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先后护送一批又一批蒙汉青年前往延安学习。10月，云清和几个同学也奔赴延安，由于到处是日伪军的关卡，他们在伊克昭盟转了40多天，最后才找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的驻地，来到乌兰夫身边。云清在新三师住了一年多，在大哥的指导下，读了很多革命书籍，学到了很多东西。1940年底，云清终于辗转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学习。后来，云清认识了曾经在土默

川做过革命工作并经常到延安民族学院讲课的中共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孔飞，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1941年7月1日，云清和孔飞结婚。

1942年，云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云清和孔飞被调到了中央社会部，安排在“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情报组，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展情报工作。秋天，她和孔飞回到家乡，正当情报工作逐步深入的时候，延安同时派出回到归绥开展情报工作的贾振业（后改名于明）叛变。日本宪兵队在贾振业的带领下，到处抓捕云清和孔飞，恰好他们两人在张家口，云清的二哥、托县游击队队长云浦和假扮长工的报务员柴宝义被敌人抓走。云清和孔飞回来后听到这个消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赶往张家口通知有关人员迅速转移，第二天又赶回家乡，连夜上了大青

山。云清和孔飞冒着生命危险开辟的绥远地下工作局面，就这样被叛徒贾振业破坏了。

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9月，经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批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今赤峰南部地区）纵队在赤峰成立。12月，孔飞担任司令员，云清也是卓索图盟纵队的组建者之一，担任组织科科长。国民党军队进攻赤峰等地时，卓索图盟纵队的指战员奔赴前线，奋勇杀敌，云清带领留下的后勤保障人员、家属子女和部队物资从赤峰转移到乌丹和林东地区。冰天雪地，滴水成冰，部队冬装暂时发不下来，有时吃饭都是问题，但是这些都没让云清退却。孔飞司令员经常带着骑兵去追剿土匪，十天半月甚至几个月不见踪影，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作都由云清负责管理，征

兵、发展党员、抚慰家属等工作纷繁复杂，但她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底，有的骑兵部队出现叛变和开小差的，由于卓索图盟纵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没有一个叛变和开小差的。云清虽然是女同志，也经常和男同志一样，骑马持枪，驰骋疆场，在部队生活、战斗长达10年之久。后来，卓索图盟纵队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云清一直担任组织科科长、机关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兴安盟军分区建立后，云清担任了干部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云清被定为准师级。1952年，云清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在部队干了整整十年的云清转业，先后在内蒙古党校、内蒙古妇联、内蒙古监委工作，级别和待遇都不是很高，这是因为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与绥远省政府合

并后，很多干部需要妥善安排，乌兰夫作为内蒙古党政军的一把手，虽然知道妹妹功勋累累，但是在安排工作方面，对云清不但没有提拔使用，而是降级使用。云清非常理解大哥的难处，不管去哪个单位，无论去做什么都毫无怨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受到诬陷，云清也受到牵连，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残酷折磨。

1975年，云清恢复工作，担任内蒙古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在她的主持下，平反了财政系统的冤假错案。她看到自治区财政人员青黄不接，就组织力量在和林县东山挖了十多孔窑洞，办起学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后来，云清调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工作，连续担任三届专职常委。1992年，她光荣离休，担任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2003年10月，云清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2岁。（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

大白菜当家的岁月

又到了卖冬贮大白菜的日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贮存大白菜是北京家家户户的一件大事。为了来年冬春时节能有菜可吃，人们受累受冻排长龙，一下买上几百斤大白菜贮存起来。而为了这昔日的当家菜，政府一年就要贴掉“两座立交桥”。

打响一场贮存战役

在很多老北京的记忆中，每年11月初，北京都要打一场贮存大白菜的战役：夜里，路上能看到一辆辆运菜的卡车；白天，街上会冒出一座座白菜山，接着便出现一条条买白菜的长龙……

战役起源于1959年。当年，北京市发起了“城乡协作、公私并举、人人动手、户户存菜”的贮存大白菜的群众运动。大白菜是京城老百姓冬春季的当家菜，可每年贮存是个大问题。1959年，本市郊区的50多万亩秋菜长势良好，其中25万多亩大白菜大部分棵大心实，净菜产量达10亿斤左右，比上一年增产1倍多。产量猛增，贮存成了难题。市人民委员会专门召开贮存蔬菜动员大

会，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贮存好大白菜，不仅产菜的人民公社要建立菜窖，机关、工厂、学校、饮食业甚至连街道居民也要贮存大白菜。

这种分散贮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可以利用一切设备，减少建窖的人力和物力。当时，全北京居民有70万户，假如每户利用屋角、床下贮存二三百斤（约三四十棵）大白菜，是比较现实的。以平均每户能贮存300斤计算，全市居民就能存两亿斤菜。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部队等集体伙食单位和饮食业，还可以分散贮存一两亿斤。如果这些菜完全由国营商业和人民公社集中贮存，那么就需要建菜窖4万多间，用工近30万个。大家动手贮存，这批人力物力就可以节省下来了。

从那时起，秋冬时节贮存大白菜便成了北京家家户户必须做的事情，并延续了好多年。

一年贴掉“两座立交桥”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物价整体水平逐渐上

涨，但大白菜的价格却很少变动。以一级菜为例，1974年4分钱一公斤，1980年5分钱一公斤，1992年9分4厘一公斤，近20年时间，大白菜价格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这显然是因为政府给了补贴在里面。

据了解，冬贮大白菜卖到6分钱左右一公斤的时候，地头上的收购价大约是4分钱一公斤，摊进流通环节的各项费用，实际上每公斤大白菜的成本大约要在1角5分钱左右，其间的差价，全部由北京市财政来负担。

“（北京市）政府已从口袋里额外掏出460万英镑以出售价格的双倍价格收购大白菜。”1988年，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北京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曾就每年对大白菜补贴一事感慨：两座立交桥没了！

全民来买“爱国菜”

1989年，向来受宠的大白菜遭遇了一次被“抢救”的命运。

这一年，北京遇到了大白菜生产过剩、卖不出去的情况。当时的大白菜有着非常神气的别名，在遍布京城

大街小巷的菜站里，堆满了新鲜的大白菜，黑板上大大地写着几个字：“爱国菜”。这年赶上多年不遇的暖冬，地里的大白菜长得格外茁壮，等到收割季节，在其他菜品也比较丰富的大背景下，1.6亿斤大白菜一下子成了卖不动的积压货。市政

府不得不紧急动员全市各个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购贮大白菜。有的单位直接把大白菜买回去当作福利分给职工。有的单位是职工

买了白菜后可以报销。连市长都亲自到菜站推销白菜。媒体机器也开动起来，电台里把“清早起来吃白菜，晚上回来白菜吃”编成了歌曲，报纸上连载着“佛手白菜”“荷花白菜”“糖醋白菜”“蒸酸白菜”“烧熘白菜”等各种新奇的做法。

这一次大白菜滞销危机，最终在行政力量促销下得以度过。后来红极一时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专门有一集《水淹七军》

讲“萝卜大丰收”指的就是冬贮大白菜滞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楼房取代了低矮的大杂院，市民贮存大白菜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北京菜篮子工程也蒸蒸日上，大白菜在老百姓冬季餐桌上的份额渐渐走了下坡路。在蔬菜供销体制改革中，大白菜一步步淡出了昔日当家菜的地位。

（据《北京日报》）